

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中国故事的讲述与传播

曾庆江 陈国泉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世界主义逐步从政治主张发展成为文化认同，进而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行动纲领。在新世界主义视域下定位和思考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有重要意义。既有的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主要体现三种趋向，存在深深的焦虑感。只有走出焦虑，走向融通，中国故事才能和世界故事相通，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界主义内涵，从而成为新世界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世界主义；中国故事；讲述；传播；融通

作者简介：曾庆江，男，教授，硕士生导师。（海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海南 海口，571199）

陈国泉，男，讲师。（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8) 02-0131-0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华人的共同愿景。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善，当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中国故事”正在深深吸引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相关组织和人士的注意。外部世界也迫切希望了解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客观”的中国。“中国故事不仅连着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更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这一重大主题，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事关中国和平、发展、共赢的战略性问题。”^[1]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将成为一个重大时代话题。以“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的新世界主义理念，逐步取代世界主义、全球化、文明中心论等成为人们新的共识。在新世界主义视域下定位、思考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世界主义：从政治主张到文化认同

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关于“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和传播，成为新世界主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前提。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随后，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宣讲、论述了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从最开始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欧、非、拉、阿及各国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形成了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情怀的“命运共同体的同心圆模型”^[2]。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文明史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给国际社会确立‘三同’，化解‘三异’”：“一是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二是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

执”，“三是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3]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世界主义提供了鲜明的注脚。新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其基本前提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极发展，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崛起。刘擎认为，“新世界主义，旨在寻求一种更可欲的未来世界秩序，并为此奠定认知的与规范的理论基础：首先，在价值立场上，新世界主义秉持人类和平、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理想，寻求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的霸权结构，建立一个公正的‘后霸权世界秩序’；其次，在认识论层面上，新世界主义理论主张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观念’，强调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揭示其在文化本身的构成、演进与变化中的至关重要作用；第三，在规范意义上，新世界主义试图重新阐释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主张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普遍主义理论：作为世界秩序之规范性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既不是先验给定的，也不是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的，而是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中建构的。”^[4]

客观地讲，无论是习近平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多次阐释，还是刘擎对“重构全球想象”的深入分析，都使得这种定位为未来世界人类福祉的“新世界主义”更接近一种政治主张，毕竟这是以中国在新世纪以来的和平崛起和力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背景的。但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容易被人视为中国的“野心”，将其等同于全球化或者世界主义的翻版，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者的“中国威胁论”者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权。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权。但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权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5]究其实质，“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在于害怕中国的崛起会与美国霸权形成双峰并峙的局面，甚至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实现和西方世界的良性沟通，可能使我们为此付出巨大的国际代价”，“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中国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以‘他者’角色存在的外部世界真正的认同与接受。”^[1]新世界主义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消解所谓的“文明中心论”，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等，因此，更应当将其视为文化认同。“新世界主义理论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建构世界秩序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各具特殊性的不同文化政治共同体，如何既尊重彼此的差异又服从共同的规范性原则，这在哲学上是一个久远而困难的命题。新世界主义反对特定文明的优越论或中心论，寻求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4]新世界主义只有作为一种文化认同，被全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形成普遍共识，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行动纲领。近些年，作为我国国家顶层战略的“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基本前提，在世界上积极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进而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新世界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媒体有较大的想象空间和实际可为空间。当然，并不是让媒体仅仅是将新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主张进行对外宣传，而是在媒体的实际操作中如何逐步体现“新世界主义”。在我们看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讲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属于新世界主义的应有之义。不过，在反思既有中国故事传播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只有走出焦虑，走向融通，中国故事才能和世界故事相通，才能真

正意义上体现新世界主义的内涵，从而成为新世界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走出焦虑：中国故事传播中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大众传媒在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传播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些中国故事成为我国对外文化展示和形象塑造的重要作品，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总体而言，中国故事传播大致体现为三个趋向：其一讲述中国五千年辉煌历史；其二是以“极地方化”叙事以求获得国际认同；其三是讲述中国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与崛起。这些故事在获得国内外认同的同时，也彰显出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体现出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中的深深焦虑感。

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底气和特色，也是中华文明在很长时间内被世界认同和仰慕的地方，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故事表达的重要内容。这首先在诸多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节目中有非常厚重的表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丝绸之路》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再说长江》《再说运河》《故宫》《记住乡愁》等，大致都是这方面体现的极致。《话说长江》（1983年）从长江的源头开始顺流而下，逐次介绍长江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物产宝藏、文物古迹等，虽然没有曲折的故事和中心人物，但足以激起民族的自豪感——经过历史的阵痛，一个古老的中华正以喷薄之势展现新的风姿！20多年后的《再说长江》（2006年）虽然更多的以人为主，以故事为核心，在表现手法上多有创新，但是以长江沿岸风光地貌、风土人情的变化为底色，来反映中国20年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巨变，依然洋溢的是古老中华的民族自豪感。《记住乡愁》虽然表现的是当代人的情感，但是故事传说、族谱、家规、古训、古碑、古树、古建筑以及祠堂等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是永远不会断绝的”^[6]。

一些现象级的电视栏目，也多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作为表现对象。比如《百家讲坛》之所以从最初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如日中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取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有力支撑。^[7]而《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华好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等电视栏目更是以中华文化作为选手竞技、晋级的重要裁决内容。

“通过传统文化知识的普及，引导人们关注、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才是电视文化类节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8]可以说，传统文化是令国人最为骄傲的，最能回味无穷的，也是中国彰显自身形象、完成当代国际定位的重要内容。但是，从本质上讲，大众媒体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下乃至未来，应当是“与时俱进的转变与再造”^[4]。一味沉浸于过去的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是现实剧烈竞争巨大落差中的隐性焦虑。

“极地方化”叙事构成了当代中国故事传播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所谓极地方化，就是非中心化、非主流化、反历史化，甚至是极度边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崛起并获得国内外认同，从本质上就是中国故事“极地方化”叙事的体现。这些电影作品或者表现“抢亲野合”，或者表现“通奸乱伦”，或者表现“妻妾成群”等，其核心事件和场面都极富有观赏价值。但是，客观地讲，这些具有相当商业价值的观赏场景，打造成“媒体奇观”，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特殊生活”来表现的。比如《红高粱》表现了中华民族粗野、强悍、勇敢的生存性格的情节，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与其说是表现中华民族的“原始的”“本质的”性格，还不如说是“为80年代在现代文明压力下中国人急于自我认同的心理提供了满足的精神镜像”。^[9]这种立足于自身民族性的做法本质上是希望获得西方的认同，果不其然，第五代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同时，却遭遇“后殖民性”诟病——“第三世界文化为获得发达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认可而刻意表现自

己的所谓的‘民族性’。显然,这是一种‘伪民族性’。”^[9]但是,第五代电影的成功却进一步刺激大众媒体的相关做法,“极地方化”叙事成为斩获大奖的重要选择,90年代的“作者电视”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无论是《沙与海》《最后的山神》还是《西藏的诱惑》《深山船家》,抑或是《龙脊》《流浪北京》等,都是表现边缘人、边缘地区的生活状态。这些作品获得良好的口碑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它们在国外频频获奖(获得西方部分人的认同)。

现在看来,以“后殖民性”对其进行指责和批评过于苛刻了些,因为这种“极地方化”在完成对边缘人或者边缘地区关注的同时,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怀意识。但是,放在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下观照,这种“极地方化”叙事在国外频频获奖,实际上只是满足了西方某些“看客”猎奇心理的需求。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同,一味迎合其“猎奇”心理,对于传播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焦虑?

以民族主义的视角讲述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是当代中国故事传播的第三个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新中国从站起来逐步走向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国大众媒体较好地记录了这一发展过程。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大众对中国未来的展望,甚至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①[4]}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以古代中国的辉煌历史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经历为背景,以当下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为根本依托,期待一个强大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众媒体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社会思潮。比如纪录片《话说长江》《河殇》其实就是这一“心曲儿”的显现。

《河殇》可能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纪录片。它“以黄河为切入点,以其代表的黄色文明为对象,深入探讨了中国几千年社会体制一成不变的根源,把‘黄河’‘长城’‘龙’等中国人历来引以为豪的意象视为阻挡中国前进的障碍,同时大谈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优越性,呼吁中国学习西方,打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局面,以期创造出一个不破不立的‘新纪元’”。^[10]这在当时被严厉批评为“民族虚无主义”。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以“不破不立”的姿态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新世纪以来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互联网时代》等更是将这一想法彰显无遗。比如《大国崛起》作为一部国际题材的纪录片,展示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总结了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这部作品在向大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式焦虑,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如何“崛起”?历史上相继崛起的大国是否给我们提供了若干经验教训?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媒体的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较好地记录了中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主流社会思潮。这种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大体上以本土化为主要内容,但是却有着全球化的想法。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不少人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为圭臬,认为民族化或者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前提或者必要条件。但是,我们所信奉的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国化”而已!急于获得所谓全球化或者国际化的认同,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中的焦虑感。

三、走向融通:中国故事传播的未来方向

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中的焦虑,固然是社会思潮的一种体现,但是客观来讲,它对我们长期打造中

① 刘擎认为:“改革时代的当务之急(硬道理)是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现代国家,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形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说，依然存在相应的短板。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中国威胁论”先后亮相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在助力我们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消解“中国威胁论”。只有走出焦虑、走向融通，才能彰显新世界主义的文化认同主张，从而更加立体更加客观地彰显中国形象，真正意义上完成新世界主义的传播建构，这是中国故事讲述和传播的未来方向。

那么如何走出焦虑、走向融通呢？

在我们看来，首先需要厘清长期以来困扰国民的“全球化”问题。全球化绝不能等同于美国化。全球化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等于或者约等于美国化，和二战之后逐步建构起来的国际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家独大，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标准”“美国认同”“美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追随或效仿的范本。甚至一些本来很有特色的本土化产品，一旦贴上美国标签立马身价百倍。比如，在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影票房逐步攀升，2017年更是达到559亿元人民币。但是，一方面是国产电影票房在整个电影票房中大约只能占到半数，好莱坞电影依然强势；另一方面，所谓的国产大片无不是向好莱坞靠拢。比如张艺谋导演的《长城》。《长城》被称为中美合拍的第一部重工业片，里面有长城、饕餮、秦腔、火药、孔明灯等一系列中国元素，但是本质上却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一个翻版的美国故事而已，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元素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故事背景，或者像一个贴片广告），也没有能够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

当然，不少民族主义者对于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但是这个警惕心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民族主义式的焦虑。因为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实际上体现了美国的“后殖民文化”，但是，如果中国文化取代美国文化成为全球代表性的文化又如何呢？可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吧。在新世界主义看来，全球化既不应该是美国化，也不应该是中国化或者欧洲化，而应当是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融通。因此，我们需要审慎地思考“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故事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自说自话地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或者是以极地方化的民风民俗的展示从而成就“媒体奇观”，而希望世界上相关国家或者民族完全接纳我们的价值观念或者道德标准更只是一种奢望。以新世界主义为基本前提，以融通为切入点，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

真正的中国故事，首先应当彰显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它要求我们在把握历史视野的基础上更具有时代气息。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优势的同时，不沉湎于过去悠久的历史 and 曾经的大国这一“传统中国”视野；另一方面，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彰显自身的特色，不硬性向别的国家和地区传递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不追随世界所谓先进文化和主流文化，不盲从、不迎合。在这个基础上讲述的中国故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具世界情怀，自然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其次，中国故事的讲述应当唤起人类共通的情感，才能获得更多的共鸣。要唤起人类共通的情感，并不是要弘扬西方奉行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应当立足于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的情感，通过大众化、人性化的表达打破国家、民族界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获得更多的认同。在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时，需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既不能流于平淡无奇，又不能追求千奇百怪，以平实、真实为基本前提。

其三，中国故事要有兼容并蓄的气度和胸怀。既不能沉浸在自我悠久的历史中“不可自拔”，也不能在外来文化中“迷失自我”。只有秉承开放、包容、对话，中国故事才能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点

和匹配点,达到对话沟通的效果。同时,面对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消息,也应当摆正心态,不必文过饰非,努力争取利用自身的媒体进行首发报道,掌握话语主动权,防止外媒先入为主,从而达到提升中国媒体公信力和可信度的作用。

其四,中国故事在传播中应当摆脱思维定势,摆脱“画地为牢”式的自我中心,努力寻找“讲述者”和“接受者”之间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平衡点,才能更有说服力。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宣传上存在着明显的内外有别,在外宣上存在明显的被动性和少量性,而且并没有认真研究接受者的情况,属于典型的“以我为主”模式,效果十分有限。如何让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最大限度得到国际接受者的认同,是需要细细考量的。同时,还需要适当借用国际媒体,让它们主动讲述中国故事。由国际媒体讲述的中国故事,更能够得到国际人士的认同,同时也隐性而客观地彰显中国开放的国际形象。

四、结 语

要走向融通,最终需要从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故事。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之间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应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一方面,以新世界主义为前提具有融通性的中国故事本来就可以达到世界故事的高度,成为人类共通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世界故事和中国故事所张扬的价值观念和主体精神应当有类同之处。世界故事是在充分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基础上的集合体,这与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故事是一致的。总体上讲,从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故事,才是中国故事讲述与传播走出焦虑、走向融通的最终呈现形态,才能真正意义上体现新世界主义的内涵,从而使得中国故事成为新世界主义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徐占忱.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J].社会主义研究,2014(3).
- [2] 邵培仁,周颖.国际传播视域中的新世界主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流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7(5).
- [3] 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使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2).
- [4]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J].学术月刊,2015(8).
- [5]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4-55.
- [6] 曾庆江.精神守望中的价值重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意义探寻[J].电视研究,2017(12).
- [7] 曾庆江,王素芳.《百家讲坛》:“百家”与“百姓”距离的近与远[J].声屏世界,2016(5).
- [8] 王素芳.浅论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发展之道[J].中国电视,2017(1).
- [9] 陈晓明.填平鸿沟,划清界限——“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J].文艺研究,1994(1).
- [10] 王铎羲.回看《河殤》事件[J].当代作家评论,2013(3).

[责任编辑:华晓红]